

红 白 黑

—— 司汤达传



HONG BAI HEI

天津人民出版社

А.ВИНОГРАДОВ

ТРИ
ЦВЕТА
ВРЕМЕН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红 白 黑

——司汤达传

〔苏〕阿·维诺格拉多夫 著

曾正平 余 诚 郑 铮 译
张秀筠 李江岸 姚炳虞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5印张 2插页 550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500

统一书号: 11672·202

定 价: 4.80 元

高尔基为本书所写的前言

为了描绘得出色，艺术家应该善于观察，甚至——善于预见，且不说他的知识应该是多么丰富。有这样一些艺术家，他们所掌握的艺术使他们在描绘生活真实的方面做得比一些堪称“伟大”的历史学家更要完美得多。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研究书本、研究历史文献和研究人、研究活的材料这两种工作之间的区别，也不仅是由于发生在过去并或多或少变得比较遥远的事情和发生在昨天，发生在今天，以及不可避免地发生在明天的事情之间的区别。

历史学家是从他自己那个时代所达到的高度来看待那遥远的过去的，他叙述的是一些业经完成的过程，他的叙述仿如法官之叙述罪行或律师之为罪犯辩护；或则满怀同情，惋惜那种可以恣意横行而不受惩罚的“古代的好时光”，或则给过去的某些事件涂上一层特别阴暗的色彩，为的是让自己所处的那个昏天黑地的时代显得要光明一些。历史学家的“客观主义”纯粹是无稽之谈，就象上帝的公正一样，关于这一点，司汤达说得非常好：“如果说上帝可以原谅，那只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存

① 基邦（173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

在。”

但凡事都有例外，这里也是一样。基邦是用一位十八世纪的人的眼睛，透过十五世纪的迷雾来看“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的，但他却把基督教的发展、它所从事的破坏性的活动及其政治上的胜利描绘得这等鲜明，仿佛他本人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人似的；在这一过程中，精神上的奴役被用来巩固肉体上的奴役，僧侣们的宗教狂热代替了带批判性的多神教的自由思想。但基邦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稟有艺术家的气质，他以他那罕见的才华让死者复活，使过去的事情跃然纸上。至于一般的历史学家，那位本人就是著名历史学家的基佐说得非常中肯：“甚至在并不希望欺骗别人的情况下，他也是从一开始就欺骗自己；他往往歪曲事实真相，为的是证明被他视作真理的东西，而违背事实则被他视作无关紧要，他的狂热压倒了自己身上的怀疑。”苏联读者当然明白，这里谈的是阶级对一个历史学家的思想“自由”所施加的压力，对他认识真理所设置的障碍。

艺术家首先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人，是时代悲剧和喜剧的亲眼目睹者或积极参加者。他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如果他在足够程度上摆脱自己那个阶级的偏见和成见的束缚，如果他有一双正直的眼睛，如果他本人就是时代精华的一部分，而他的创造力又是全部用来实现阶级觉悟不断提高的劳动人民为自己提出的坚定不移的目标的话。文学家劳动的特点不仅在于它有着来自直接观察和亲身经历的巨大力量，而且在于作者所处理的那些生动的素材能够抗拒文学家身上那种随心所欲的阶级爱憎。正是生动的素材所具有的抗拒艺术家个人好恶的力量能够说明这样一种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越来越多的文学家成为描

述自己所属阶级的生活的公正的史家，无情揭露这个阶级的种种恶习以及它的庸俗、贪婪、残忍和它走向“衰亡”的必然过程。欧洲作家们对市民生活的稳定性所唱出的赞歌如今正逐渐为挽歌所代替。

司汤达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几乎在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第二天，就头一个开始鲜明而透辟地描绘资产阶级内部分化的必然迹象以及这个阶级的冥顽不灵和鼠目寸光。法国文学史家把他归入“经典作家”的行列，但又作了某些保留。未必能够说，法国人把司汤达视为自己的骄傲。

法国批评界对这位最富有独创精神的艺术家和其他一些人所持的冷漠态度，其原因已经完全正确地被本书作者阿·科·维诺格拉多夫在其为法国作品的俄译本所写的一篇极有价值的前言中所阐明。阿·科·维诺格拉多夫把进一步探讨法国批评界之所以对某些法国作家所写的具有真正的社会政治意义的作品给予不公正的评价的原因，视作自己的社会责任。这种探讨对于我国读者，乃至对于一些青年作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和富有教益的。

司汤达是作家被批评界歪曲得面目全非的一个极鲜明的例证。兰松教授在其所著的《法国文学史》中是这样谈起他的：“他个人的种种奇遇丝毫不使人感到兴趣。”

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人，他曾参加过拿破仑对莫斯科的进军，亲身经历过军队败退和覆亡的悲剧；他曾和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意大利烧炭党的主要领袖们过从甚密，曾被奥地利政府判处死刑，并且几乎毕生都是在警察的监视下度过，——这一点也是极为有趣的。

记不清是谁，好象是法格吧，曾经说过，在军队溃败和大

靴冻死的悲惨日子里，在纪律极端涣散的情况下，司汤达每天上班时都把脸刮得干干净净，军服也穿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十分安详，既没有失去自己那种分析事物的热情，仿佛也不相信拿破仑已经失败。”

这——就是这个具有坚强意志和历史主义感情的人的特点，他尽管也佩服拿破仑的精力旺盛，却也懂得，如果说那位欧洲的征服者对俄国农奴起义所抱的指望落空了的话，那也并不意味着历史已经停滞不前。

兰松还说：“司汤达的文学创作产生于他对那种积极的生活的爱，并受这种爱所支配。”“司汤达最喜爱的是精力”，——司汤达一生所过的不安定的生活证实了这种揣测的正确性。正是对生活的向往成了司汤达作品中唯一真正的主人公，从他的小说中，人们感觉不出作者是在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强加给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强加给现实。在这方面，他是一位首创者。凭着自己的才华，他把一桩最普通的刑事案件提升到对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哲学探讨的高度。他头一个在资产阶级的圈子里发现并且气势磅礴地描绘了于连·索黑尔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一个因为自身的社会地位低下而奋起反抗的农民”，在这个社会里，市民暴富，而那些在革命年代里变穷了的贵族则越来越市民化。

于连·索黑尔生活在这样一些人中间，这些人“每天早上起来，从来不用考虑这样一个刺心的问题：‘今天我能在哪儿弄到午饭呢？’”

引号里的话是索黑尔本人在他那个阶级的法庭上说的，仿佛与作者的意愿相反，他用这句话贬低了自身未来的意义和自身悲剧的意义，这个悲剧并没有因他的死亡而告终，而是持续了

一百年，并且至今仍在被欧洲的青年们重复着。

于连·索黑尔被资产阶级社会砍掉了脑袋，但这个虚荣心极重的年轻人却换上其他的名字在欧洲和俄国的一些最大的作家的作品中复活了：他出现在布利维尔——季顿和阿尔弗雷德·缪塞、巴尔扎克和莱蒙托夫、显克维支和保尔·布尔热和其他一些人的作品之中。甚至象斯列普佐夫^①、波缅洛夫斯基^②、库谢夫斯基^③这样一些没有得到应有评价的我国作家也用自己那种尽管粗糙，却又不失为准确的描绘复活了他的形象。

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索黑尔可以被视作这样一类“英雄”的始祖，这种人刚一踏上人生旅途就曾相信，高度发展的智力能充分保证他们相应地获得高贵而又独立的社会地位，保证他们思想和意志的自由。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虚荣心极强，却又在生活中“缺乏信条”——那种使理智与意志相协调的社会信条。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不乏由它自身炮制出来的“信条”，但却缺乏其中最主要的——能在这个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条件所允许的范围使动物本能人性化的信条。

司汤达在长篇小说《红与黑》中描写的是一场个人与社会相冲突的悲剧。围绕这种悲剧，一八七〇——八〇年在我们俄国，人们不知发了多少空洞无用的议论；而只有当市民社会彻底灭亡的时候，这种悲剧才得以根绝。

法西斯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创造大大增加了这类悲剧，其数量成千累万，形式也更加野蛮。毋需成为一个预

① 斯列普佐夫（1836—78）——俄国作家。

② 波缅洛夫斯基（1835—63）——俄国作家。

③ 库谢夫斯基（1847—76）——俄国作家。

言家，就可以满有把握地说：这只会加速市民阶级的灭亡。

司汤达凭着其洞察一切的智慧和想象力看清了市民阶层的虚伪、假仁假义和市民社会中存在着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阿·科·维诺格拉多夫完全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批评家们闭眼不看司汤达得出的那些危险的结论。他成了当时文坛上的异己分子，理解到这一点，他曾戏谑地而又几乎是了无错误地说过：**‘我的作品要到一九三五年才会有人读。’**”实际上，人们在此以前就开始阅读并理解他的作品，文学家们则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向他的作品学习，并将长久地学习下去。

看来，人们还会长久地从法国批评界对他所作出的评价出发来评论他，就象那位有才气的斯蒂芬·茨威格所做的那样，把司汤达归入“自己生活的歌手”之列，而不把他视作诗人和创造性力量的歌颂者。

我们的年轻作家们如果能向这位善于把一桩普通刑事案件扩展渲染成一幅色彩鲜艳、气势磅礴的时代画卷的人学习，那将是大有裨益的。年轻的作家们常常把一些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给糟蹋了，在着手写它们时对往日的素材缺乏认真的研究，而对迅速发展着的现实，有的也只是一些极为肤浅的了解。

关于司汤达的写作“风格”，我还想谈几句。象许多人一样，兰松曾经说过：“司汤达作品的形式根本称不上别具一格；也根本称不上艺术；无非是在那里剖析自己的思想。”巴尔扎克对司汤达的描写手法同样评价不高。茨威格显然受了法国人的意见的影响，也断言，司汤达写作时“对风格、完整性和形象的鲜明性漠视到了这等程度——简直象在给朋友写私人信件似的。”如果可以把司汤达的作品拿来和信件作比较的话，那

么把它们称做写给未来的信倒是比较正确的。

只有一个人反对对司汤达的语言艺术持否定态度，那就是居斯塔夫·福楼拜。他在给自己的朋友阿尔弗雷得·列·普阿特文的信中写道：

“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读了司汤达的《红与黑》第一卷。这部作品文笔细腻，趣味隽永。风格——是法国式的；这难道仅仅是普普通通的风格？不，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风格！一种如今根本没有人能掌握的古老风格。”

这位就风格而言无与伦比的大师所作的上述评价驳倒了所有批评家的意见。后者还责备司汤达，仿佛他写得十分仓促，因为他“不想让一个艺术家有时间去斟酌风格，并把现实加以美化”。但现实既可以是其主人公——人民群众——为争取摆脱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桎梏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也可以是一种直接间接地为人奴役人的现象进行辩护的“编造出来的童话”。只有在前一种情况下，现实才要求并且值得加以“美化”。

这本书还给司汤达以迄今为止人们还未曾见到过的本来面目。

作者的话

一九三三年是亨利·贝尔^①诞生一百五十周年。一九四二年则是司汤达逝世一百周年。无论在什么地方，漫不经心的批评界都没有认真纪念过这两个年度。但有一个意义更加重大的事实足可作为对这位作家的纪念：二十五年来他的作品在苏联的印数较之一百年来在全世界的印数还要多出一倍。司汤达是一位得到公认的“苏维埃”作家。从来没有一位作家有过司汤达那样奇特而又非常的经历。他的那些煌煌巨著问世来的这一百年，是资产阶级批评家的聪明才智日趋衰竭的一百年，也是我们这位作家青春焕发的一百年。这种合乎规律的现象被某些法国人视作“咄咄怪事”，他们挖空心思，说什么也要把司汤达——作为作家也作为人——撕成若干块，并在每一块上都烙上曲解者的名字。

本书是力图恢复司汤达完整形象的一个尝试，这个形象不是用各个年代的批评家们和那些跟着法国评论家亦步亦趋，只会把七星出版社^②出版的政治上被阉割了的“伪评论”变成俄文翻版的形式主义“文学研究家”们所留下的碎块拼凑起来

① 司汤达的真名。

② 此处用的是法语原文。

的。作者大胆依靠自己对各种档案所进行的新的而又完全成功的探索，这种探索使他不致成为把别人的思想从法国出版物中简单地翻译过来的“权威”。那位资产阶级批评家艾米尔·法格象个检察官一样大声疾呼，要求公众把司汤达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危险人物加以审判。“司汤达只对那些下等阶级感兴趣！”“司汤达没有宗教信仰，是个活跃的无神论者！”

“司汤达散布古老的唯物主义毒素！”一句话，“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把这位作家置于别人的时代之中。”

我们毫不畏惧地把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这位继承人接纳到我们的时代中来。“司汤达是作家被批评界歪曲得面目全非的一个极鲜明的例证。”“未必能够说，法国人把司汤达视为自己的骄傲。”——马·高尔基写道。一直到最近，法国人在阅读司汤达的作品时仍然抑止不住那种强烈的好奇心，他们为彻底认识这位作家作了种种徒劳无益的尝试，而这正好证明他是不朽的。

但各种有意无意地歪曲司汤达的现象仍屡见不鲜。不消说，当一九二八年的一位评论家用男性所特有的软弱无力来代替《阿尔芒斯》中的主人公玛利韦子爵的阶级属性上的软弱无力时，他是在有意识地歪曲司汤达所提供的社会分析，其结果首先是证明了自己那种阉割式的批评的软弱无力。不消说，当科缅日伯爵一九三〇年在自己那本《骑兵司汤达》中把司汤达变成一个假绅士和唯美主义者时，他是不自觉地停留在贝尔平生经历中那些能够被这位伯爵半通不通的脑袋所接受的特点上，而顾不上别的一切了。不消说，当有些人从他们那种与众不同的客观主义出发，要求我“贬低司汤达的形象，因为卑鄙和随波逐流是他的特点”时，他们的话恰恰证明了下面这句谚

语的正确性：“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它。”在本书第五版问世之际，我可以幸福地说，这本书之所以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是基于一种对未来的美好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鼓舞着我们的青年一代，并使司汤达对我们国家比之对资本主义国家来显得更加亲切。而把这种对未来的感情表达得最好的正是司汤达本人：“迄今为止，黄金时代一直被盲目的传说当成过去的事，实际上它就在我们前方！”^①

本书引用的许多崭新的资料摘自屠格涅夫所保存的大量档案，记述对象的一致使它们彼此联系起来。这些资料不但在司汤达的祖国不为人们所熟悉，在俄国也从未发表过。把它们在叙述中加以引用，这种做法是否恰当可以争论，但公布它们这一事实本身就会使这位作家与俄国的联系得到一种新的说明。

① 语出法国卓越的思想家圣西门（1760—1825）《新基督教》一书。

序 幕

第一章

晨曦初露，九月的朝阳刚刚照亮结满一串串红色果实的花楸林树梢，一阵军号声便蓦地响起，撕裂长空。号手们的晨间合奏，惊醒了在晨雾中微睡着的一座古老的俄国庄园，使它活跃起来，骚动起来。好几连法国近卫军骑兵很快排列成三列纵队，紧跟在大军后面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向前开拔。前头的队伍已经下了山，经过一个池塘，穿过一座寂静的、荒无人烟的村庄，鱼贯地进入高耸的石壁和长满小橡树的丘陵之间的隘口，朝着莫查伊斯克大道进发。十分钟过去了。这支象长蛇一样蜿蜒前进的队伍已经延伸得足有一公里长。先出发的队伍和后续的队伍之间已经拉开一段很长的距离。这时在两支队伍的间隔处，在一座遭受严重破坏的贵族庄园的两根石柱间，出现了一位骑白马的人，只见他眯缝着眼睛，蹙着额头，迎着太阳光凝视着眼前的道路。离他身后一百步远，是一大群骑在马上，而又不保持骑兵队形，衣着显得五光十色的人。这就是波拿巴，簇拥着他的是大军的将领们。波罗丁诺战役后，这位统帅患上重感冒，疲惫不堪，睡眠不足，但今天却感到精神抖擞。将军们兴高采烈。这是向莫斯科发动的最后一次进军。

代替那些被付之一炬的村落的是一些空荡无人，但总算免

于兵燹的村庄。已经听不到鸟儿的啁啾，也看不到缕缕炊烟。这阒无人迹的凄凉景象更加深了俄罗斯寂寥的晚秋所唤起的沉重心情。队伍穿过了莫查伊斯克县境。侦察兵们不时地跑回来报告情况。采取了警戒措施。马匹被领到柔软的地面上去行走，禁止士兵唱歌和大声喧哗。号兵们接到命令，要他们收起军号。凡是反光的東西都得遮起来。但俄国人不战而退。哪儿也找不到他们。老库图佐夫的军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丘陵和沟壑使军队无法安安稳稳地前进。在一个最高的山丘上发现了一些塹壕。队伍前方一米里亚^①处，有一群为数不多的骠骑兵负责侦察，另有三名各自分布在队伍两侧同样距离的地方。他们不时地跳下坐骑，把马匹交给别的人，然后爬到树上去，以便看得更远一些。但哪儿也找不到俄国军队的踪迹。

临近中午的时候，扬扬得意的心情便代替了惶惶不安的感觉。映照在头盔和金鹰军旗上的阳光——俄罗斯的苍白黯淡而又变化无常的阳光——突然间变得火一样地鲜红，象是在和那位骑在马上的孤独的科西嘉人一道欢呼，这次艰苦的长征终于临近结束。人们的声音听起来比较自信，目光看上去比较有神了，军官们开始说说笑笑，互相打招呼。山丘越来越高。后面的队伍也陆陆续续地赶了上来。

下午两点，法国军队登上山顶，顿时目瞪口呆，默默无言地停了下来；山后出现了亚洲心脏的宏伟画面。^②这座伟大的

① 一种在各国有所不同的长度单位，旧俄时相当于七俄里。

② 法国军队是沿着从菲列伊通向多罗戈米洛夫关卡的道路逼近莫斯科的。九月二日拿破仑借司令部人员登上那座可以俯瞰莫斯科全城的波克隆山。

莫斯科^①的城市伸展在法国人眼前，显得金光灿烂，五彩缤纷。目光炯炯的元帅们大声欢呼，用华丽的词藻把莫斯科比做“北方的底比斯^②”“童话里的印度”“展现在新的亚历山大眼前的东方的巴尔米拉^③”。

达律^④元帅的随员中只有一个人没有分享这种虚夸的赞叹心情。他是个二十九岁的军事委员，名叫亨利·贝尔，是元帅的表弟。

骑马的人都挤到一块儿来了。军官和士兵混杂在一起，军事委员们紧紧地围在元帅身边，尽管按军衔他们是不能这么贴近元帅的，但谁也没有去注意这种混乱现象。人们忘掉了危险和曾经经受过的苦难。这场奇特的谜一样难以猜透的长征和这个充满无法解释的意外事件的亚洲国家也不再使人感到惶惶不安。皮埃尔·达律，象是在把一篇早就开了头的演说继续发表下去似的，安详而又庄重地扔出一串串流利的句子，其中既包含着拿破仑的近臣所特有的缜密的思想，又包含着贺拉斯作品的优秀翻译者所特有的优雅的词令，两者结合在一起了。只听他带着一种含蓄的赞叹心情说道：

“这一天对所有人说来都将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历史性的日子。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参加这次征服俄国的战争的每

① 连续三百年统治印度的突厥人巴布里德王朝名。

② 上埃及城市。古埃及中王国及新王国的首都。

③ 叙利亚沙漠绿洲上的古老城市，纪元前1世纪到公元5世纪期间为巴尔米拉（包括叙利亚和埃及）的行政中心。

④ 达律（1767—1829）——法国元帅，拿破仑的战友之一，又是司汤达的亲戚。柳鸣九同志在其主编的《法国文学史》中称：“1799年，斯丹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心学校。他来到巴黎，由在拿破仑手下任军事要职的亲戚皮埃尔·达乌介绍，在军事部谋到了一个职务。”达武元帅确有其人，此书中亦曾提到，但他和司汤达的亲戚关系，任何书中也不见记载，故柳鸣九同志所说的“皮埃尔·达乌”恐系“皮埃尔·达律”之误。